

UNLOCK THE VALUE OF HISTORY

# 从历史中发现价值

高瑞泉 著

哲学家不能只将明灯高举过头顶，却让阴影留在自己脚下，现实的关怀和体认可以引向哲学的诗情。

# 从历史中发现价值

UNLOCK THE VALUE OF HISTORY

高瑞泉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总编辑:徐惟诚      社长:田胜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历史中发现价值/高瑞泉著. -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ISBN 7-5000-7397-6

I. 从… II. 高… III. 价值论(哲学)  
IV. B 0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9883 号

责任编辑:简菊玲

责任印制:王丽荣

封面设计:姜海利

从历史中发现价值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68318302)

<http://www.ecph.com.cn>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12.375 字数:323 千字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000-7397-6/B·12

定 价:38.00 元

# 自序

一切不存偏见的人们，都不会拒绝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晚近一个半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当初李鸿章们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都道出了历史的真相。从清咸丰同治时期到 21 世纪的今天，上自政治法律制度，下至百姓日用，中国社会变化的深度和广度，实在是无与伦比。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更深深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马克思曾经说西方资产阶级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说：20 世纪中国人创造了不同于秦汉的长城、隋朝的运河和从阿房宫到明清故宫建筑的奇迹。

一个多世纪以来，与社会变革同时发生的还有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深刻变革。实际上，精神领域的变革本身就是社会变革的一部分，有时甚至是某些社会变革的原因。它是伴随着一系列重大争论实现的，并且由此引发了诸多社会思潮，几度在观念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所有这些都不可能不引起哲学家的思考和反省。事实上，在形上世界里，中国也经历了一场革命。哲学虽然可以被称做玄学的王国，但是它终究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因此，毫不奇怪，在哲学史上有一席之地的中国近代哲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深深地关切着这场大变革的进程和方向，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卷进了各种争论。柯林伍德说过：“要考察任何一个特定的民族在其历史的任何特定时期中在哲学上的特别突

出的论题，就要找出使他们感到正在唤起他们全部精力的那些特殊问题的征象。而边缘的或辅助性的论题则显示出他们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殊困难的那些东西。”<sup>①</sup>那么，什么是令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精英最感困惑的问题？我以为，首当其冲的是历史。这里的“历史”并不是一般历史编纂学意义上如何叙述历史事实，而是如何通过诠释历史来认识当下的现实，通过理解历史来认识我们自己。因为，中国被西方列强拖入现代化行程之际，历史的意义突然变得晦暗不明了。因此，当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时候，作为一个预感到古老的中国将发生巨大变化的哲学家，他希望通过把握历史之心的跳动来把握历史大道，或者后人更习惯的说法——历史规律。事实上，历史观或历史哲学是近代中国哲学革命最先有所突破的领地，也是充满了论争和歧见的场所。决定性的一步是进化论打破传统的循环史观，而后唯物史观独领风骚数十年。但是，如何看待传统的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还夹杂着现代性批判方兴未艾，说明历史哲学像其他复杂的哲学问题一样，始终是在解决的途中。

与历史并列，使 20 世纪中国人倍感困惑的另一个问题是价值。当历史的面目晦暗不明的时候，“我是谁”真正成了问题。既然我们不知道身处的历史之流指向何方，我们就无法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价值和历史同样都是人之所造，创造历史的主体同时创造着价值。不过历史可以说是创造活动本身，而价值使创造活动具备了超过单纯经验的意义。从文明地平线下走出的人类，从来都生活在他们的价值世界之中，指向某种目的和意义的活动方才构成历史，才有理想的建构和冲突、现实的幸福和痛苦。虽然我们无例外地受历史和传统的影响甚至支配，但是只有某段历史为我们所研究、欣赏、描写和反思，才使我们自觉到历史的价值。不幸的是，不但我们与我们的前辈，或其他民族的人们因为不在同样的时空——历史总是在其中演化着——而可能身处迥然不同的意义世界，而且同一历史时段中的人们，也未必活在同样的世界中，相同的物理时空对他们展开着相异的面貌。身处动荡年代的人们，有时甚至会

<sup>①</sup>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31 页。

如梁任公所说，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作战，乃至面对重大选择，在鱼与熊掌之间徘徊。此类情形，以晚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为尤。

近代中国曾经出现过历史与价值的复杂冲突。一方面，在近代的开端，固有的价值系统与历史的客观趋势不能相容；传统价值的有效性受到怀疑，价值迷失成为时代的巨大困境。另一方面，生活世界在演变的历史中，渐渐产生出新价值的强烈要求，经过近代洗礼的本土文化资源和随着欧风美雨而来的西方文化，也提供了重构价值的资源。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思潮，更不用说许多无法用概念清晰地表达和系统安排的期待和愿望，发生着持续的冲突。后经学时代的到来，多元价值并存的状况内在蕴涵着价值相对主义的趋势和重建普遍价值的努力之间的矛盾，制约着我们的时代和精神状态。

本书所收，大致上记录了我对上述两大问题的思考。这些主要作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章，曾先后在各种书刊上发表过。时间迁延既久，文辞之间有些互相交叉，但是现在结集出版，除了偶尔有文字上的处理外，仍然大致保持原状。因为虽然涉及到的问题还大有继续讨论的空间，但是我的基本观点并无大的改变，而且讨论的话题比较集中：以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为中心，偶尔旁逸至思想文化领域。第一编以近代社会思潮为入口，用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的方法，提出如何从总体上把握民族精神的主流，进而分梳了近代以来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精神倾向各自的意义与问题。其中包含着我对这个大时代所做的基本判断：无论社会形态还是思想状况，这个革命时代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里的“革命”，是在根本性的变革、事物的质的飞跃这样的意义上使用的，大致相当于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那个广义的“革命”界说。与传统主义谴责革命的态度不同，我认为近代在中国发生、一度曾经相当激化的革命，有其充分的历史的理由。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要在相对短的时间里采用现代形式获得民族复兴，不经过大冲突和大动荡，是难以想像的。

历史是人的有意志的活动的结果，价值是人的创造和赋予。因此历史与价值两个范畴都离不开“意志”。与中国古代哲学比较少的讨论意志范畴不同，无论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变革，还是价值世界的重建，

都与“意志”凸现为重大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近代哲学主体性上升的表现之一。本书第二编讨论的近代哲学家的意志理论，都或多或少带有意志主义的色彩。唯意志论或意志主义曾经长期被视为消极的、负面的甚至“反动”的哲学派别，我的研究试图说明，像一切哲学派别一样，中国近代唯意志论也有其合理性。它们具体展现为历史观和伦理价值观两大领域。其最积极成果，是人文精神的高扬：不但改写了传统的天命史观，而且超出偏狭的理性界限去观察人的心灵，在更高的层面上复活了真善美统一的人格理想。

更具体地讨论近代以来价值观变革诸多问题是第三编。我以为近代价值观变革的中心与难题是伦理价值和道德问题。前三篇对“天人”、“群己”、“义利”三大问题的讨论，是我研究这段精神史的大纲，如何展开细密的研究，尚有待时日。但是我相信应该从历史中发现价值，因为基本的路径总是显示在客观之道与人道的结合点上。人们普遍希望的“继往开来”，只有在认真清理近代的变革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现在依然是过渡时期，变动频仍，人们的困惑甚多，这也是采用“后经学时代”这一概念的原因之一。走出这一时代，建构合理的价值体系和有效的道德规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征。

“现代性”是最近十年来引人关注的话题。与抽象地从负面角度批评现代性的学者不同，我以为在当下来谈论现代性与中国的问题，不能忘掉中国的现代性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哲学应该进行现代性反思，但是中国的现代性批判，首先应该清理其形成的历史，弄清它们如何在应对中国的特殊问题中形成某些新的观念，这些观念又如何被做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解，它对当代生活的意义如何。只有对这些都做了详细的分析，才可能做出具体的合理的批判。对于中国的现代性的研究，促使我出版了《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一书；现在收入本书第四编的，都是在此前后发表的单篇文章。主要是清理了“进步”、“创造”、“竞争”等这些现代观念。究其实，对每一个关键的现代性观念，都可以做更专门、细致的研究。对那些已经渗透进我们日常生活的观念，用理性的方法认真反省和分析，是哲学的任务之一。因为真正成为社会公共价值的有效部分的东西，一定不仅仅停留在义理的层面，而是经过风俗、习尚深入到心理的

层面，成为人们习焉不察的观念。

现代学术的发展越来越要求专家之学，但是我所做的研究却比较宽泛。就前十年的学术兴趣而言，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哲学，但决非局限于一家一派。我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就单个哲学家的个人成就说，中国近代可能没有黑格尔、康德，没有朱熹、王阳明。但是就 150 年哲学探索的整体内容而言，其丰富程度足与春秋战国媲美。在这 150 年中，无论沿着传统的经学——国学的路向做哲学史的诠释，还是将外国哲学家的思想学说介绍进汉语世界，或者独辟蹊径希望作出个人的哲学创造，都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一部分，都是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不过，这与现在流行的所谓“同情的理解”的说法还有些差别。所谓“同情的理解”是对我们的研究对象，要像陈寅恪说的，“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sup>①</sup>。其实，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同情的理解”是否可以普遍化不是没有疑问的：哲学就是在争论中进展的，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学派和人物可以有绝然相反的解答，研究者之同情寄托在何方？所以，就哲学史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同情的理解”，在这里，最底线的态度是“平等的眼光”，较高明的标准是“批判的头脑”。这并不表示我们对前人缺乏敬意，因为对一个哲学家的最好的尊重，莫过于对他的学说做批判性的研究。因此，近代以来围绕着那些最重要问题展开的哲学讨论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而不论参与者是何人。

另一方面，哲学史的研究，正如该学科的名称暗示的，既是哲学的，又是历史的。或者说既有理论的创发，又有学术的积累和知识的增长。换言之，作为现代学术的一个门类，中国哲学将有待于在两个相关的方向上获得发展：作为理论的中国哲学创造和作为学术的中国哲学研究。稍加注意，即不难发现，整个 20 世纪中，对中国哲学史的学术发展真正做出贡献的，主要是三类学者：自由主义、传统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又以

<sup>①</sup>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247 页。

后两种学者最为卓著。其重要原因，我想应该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在哲学上确实都有自己的创造。而哲学史固然可以说是思想史的一种，但更重要的它是“哲学的”历史，即是一种将对人类生存和精神的反思作概念化安排的系统，具有更高的自由度和更强烈的创造性。黑格尔说过，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虽然有些人未必同意这种哲学史观，但是任何哲学家，只要他确实是哲学家，同时又做哲学史的研究，那么实际上恐怕或多或少都会遵循黑格尔的法则。简言之，哲学家会用其一贯之道，去诠释或评判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哲学或思想运动。无论多么开放的思想系统，只要它是一个哲学体系，就一定有某种不可逾越的边界，有某种排他性。但是历史上的哲学可能因为它而呈现新的秩序与意义。这种哲学史的研究其实同时就蕴涵着哲学的创造。当然，作为学术的中国哲学研究也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可以在发现新知、传承文明和中外交流等方向作进一步的发展。

无论是作为理论的中国哲学创造，还是作为学术的中国哲学研究，都是我心所向往的。我的哲学史兴趣，原本是在思想最禁锢的“文革”时期出于对现实的多种困惑而引起的。做研究生的时候，正逢思想解放运动在曲曲折折中展开，也算亲历了某些思想变迁的过程。我始终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主流与近代以来的哲学变革有首尾相接、互相呼应之象。换言之，当代哲学的问题，大多与近代以来的哲学变革有关。因此，我的学术兴趣、理论热情与现实关切是相通的。哲学家不能只将明灯高举过头顶，却让阴影留在自己脚下，现实的关怀和体认可以引向哲学的诗情。

出震古逝土，《震二震从震既》，《吉既往震土庚辛震中艮巽巳》；震寅初①  
。震丁巳震，辛0801，壬通

# 目 录

	早逝文豪墨宝	第三部分
101	—— 张之洞改“太平天国”为朝政机构	
102	—— 咸阳赵义书局办报馆“种树人头”	
103	—— 黑龙江孙家起字号：“经文郎义”	
104	—— 陈友芝改名中兴张氏“将乡与镇”	
105	—— 胡厚卿行封神记又主同叔祖	
106	自 序 —— 1 出处	
	第一编 传统与变革	第四部分
107	—— 邓子宽著《近代思潮与社会变迁》 —— 2	
108	—— 姚期智精研论社会思潮的研究方法 —— 13	
109	—— “新青年”把握民族精神的主流 —— 27	
110	—— 乐观主义及其问题 —— 41	
111	—— 中国近代哲学中的悲观主义 —— 51	
112	第二编 意志、历史与价值	
113	—— 龚自珍——近代唯意志论的先驱 —— 66	
114	—— 谭嗣同“心力”说初探 —— 78	
115	—— 章太炎“依自不依他”说评析 —— 89	
116	—— 梁漱溟意志主义哲学构架简析 —— 102	
117	—— 熊十力意志理论评述 —— 116	
118	—— 鲁迅的“意力主义”及其超越 —— 125	
119	—— 郭沫若与茅盾：从自由意志到历史必然 —— 137	

第三编 重建意义世界

价值观转变：“继往开来”如何可能	—	151
“天人之辩”的近代展开及其终结	—	168
“义利之辩”：鱼和熊掌何以得兼	—	180
“群己之辩”与近代中国价值观变革	—	196
沟通功利主义与德性论的尝试	—	209
走出后经学时代	—	219

第四编 中国的现代性

从学习型现代性到反省型现代性 —— 254

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精神的转向 —— 260

什么是“中国现代精神传统”？ —— 277

动力的追寻 —— 288

论“进步”及其历史 —— 304

在进化论传播的背后 —— 314

创造与传统 —— 328

中国人观念世界中的“竞争” —— 349

从“圣人”到“平民” —— 361

“天人合一”的现代诠释 —— 371

弘扬民族文化与学术 —— 388

“熟读其文”与“熟读其书” —— 405

# Contents

(80)

- Preface** ..... (1)

## Part One Tradition and Change

- Modern Trends of Thought and Social Transitions ..... (2)
- On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Trends of Thought in Modern Society ..... (13)
- Grasping the Main Aspect of the National Spirit ..... (27)
- Optimism and Its Issues ..... (41)
- The Pessimism in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 (51)

## Part Two Will-Power, History and Value

- Gong Zizhen——A Forerunner of Modern Voluntarism ..... (66)
- A Tentative Exploration of Tan Sitong's Idea of "Mind Power" ..... (78)
- A Commentary on Zhang Taiyan's Idea of "Dependence on Oneself instead of Dependence on Others" ..... (89)
- A Brief Analysis of Liang Shuming's Philosophical Formulation of Voluntarism ..... (102)
- On Xiong Shili's Theory of Will ..... (116)
- On Lu Xun's "Voluntarism" and Its Transcendence ..... (125)
- Guo Moruo and Mao Dun: From Free Will to Historical Necessity ..... (137)

## Part Three Reconstructing the World of Meaning

- Values' Change: the Way to Realize "Carrying Forward the Cause and Forging Ahead into the Future" ..... (151)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the Debate on Heaven and Man” and Its End	(168)
(1) “The Debate on Righteousness and Profitability” and the Change of Values in Modern Times	(180)
(2) “The Debate on Group and Individual” and the Change of Values in Modern China	(196)
(3) An Experiment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Utilitarianism and Theory of Virtue	(209)
(4) Going out of the Age of Confucian Classics	(219)
<b>Part Four China’s Modernity</b>	
From Learning-Type Modernity to Introspection-Type Modernity	
(1) The Modernity and the Modern turn of Chinese Culture Spirit	(254)
What is “the Tradi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pirit”?	(277)
(2) A Seeking for Driving Force	(288)
On Progress and Its History	(304)
(3) The Preconditions and Theoretical Paths for Chinese Establishment of Beliefin Progress	(314)
(4) Creation and Tradition	(328)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etition” in the Chinese Conception	
(1) From “Sages” to “Ordinary People”	(361)
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Union of Heaven and Man”	
(1)	(371)

# 第一编 传统与变革

## 近代思潮与社会变迁

20世纪初,一度执思想界牛耳又退入书斋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劈头就说道:“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sup>①</sup>中国近代,正是一“文化昂进之时代”,在短短百余年间,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一扫龚自珍所哀叹的万马齐喑般沉寂,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奔涌而出,交错叠代,争持消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景观。

人们习惯于将近代与春秋时期相提并论,因为两者都恰逢社会转折、观念巨变并由此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然而,考察近代社会思潮的结果会使人们相信,在思潮的纷繁复杂、倏忽变化、覆盖广泛等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实在难与近代媲美,其中必有深刻的原因或根据。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主要梳理了清代的若干学术思潮,涉及其原因时

---

<sup>①</sup>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页。

则主要从学术理路的演变出发,即主要从理性自治的内在根据着眼。但是近代社会思潮远远超出了学术的界域,影响到十分广阔的社会层面。因此,它们之所以发生,除了有理性自身的原由,还存在着知识社会学方面的原因。换言之,从发生学说,中国近代众多社会思潮的涌现这一文化现象,与近代社会变迁所造成的历史条件有密切的关联。因此,从理智史与社会史结合的方向,可以更清晰地俯瞰近代社会思潮的根源。

从最显性的生活世界看,鸦片战争拉开了近代史的序幕,紧随其后出演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突然面对着一个全然陌生的难题:中国向何处去?之所以称它是全然陌生的,是因为不仅汉唐盛世的诗人或哲学家不必以此自扰,康雍乾诸朝的君主与臣民们都沉酣于太平之中。只有到了19世纪中叶,千年帝国固有的治乱循环的逻辑突然被完全打乱,再也无法照旧演绎下去,才有了这一全新的指向未知世界的问题。对此的答案很自然就会各种各样;加之中国幅员广袤、历史悠久,情势逼迫中国人必须在短时期内形成一个足以调动全社会资源的政治—文化设计,其最初的结果必定是诸说杂陈、相争相生。简言之,中国近代各种社会思潮,不管其成败如何,不管其内蕴的真确程度如何,都从属于那个历史性的问题。作为一种社会前途的设计,都是这场社会选择的备选答卷。

从深层的心理世界看,浸淫日深的权威丧失是近代涌现众多社会思潮的主要精神背景。

汉代以降,中国人尊崇的权威是与皇权统一的儒学价值系统,清代沿袭宋明,以程朱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维持着原先的价值。但是情况在悄悄地变化:以李光地为代表的清代理学已经没有创造性可言,吸引知识精英的是考据学。如果就学术思潮而言,考据学代表了清代前期至盛期的主流,按梁启超的说法,就是“清代思潮”。但是,“‘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sup>①</sup>。古文经学能

<sup>①</sup>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页。

否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相提并论，暂可置之不论，但宋明理学盛极而衰，至明清之际“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sup>①</sup>。不仅从古文经学中培育出一批具有批判意识的学者，而且在近代的门槛上，古文经学一变而由今文经学主领风骚，更是异端辈出。开拓者龚自珍已经以“心力”对抗“天命”，对传统的天命论价值系统提出了挑战，至戊戌年间，今文经学演化为冲击权威、解放思想的工具。“儒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过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对儒家基本的社会一政治价值观和信仰，却是很少被准许各抒己见的。康氏已经使人对这些主要的价值观和信仰产生疑问，这一事实即意味着作为中国信仰核心的儒家正日趋衰微。当康有为在改变长期被公认的孔子形象和孔子学说的价值观的内核方面走得如此之远时，其含义就更加严重了。任何读过康有为的富于煽动性解释的人必然会产生一个感到烦恼的问题：儒家的本来面目和特征何在？这个问题的出现预示着这样一种后果：使儒家学说从一直是无可怀疑的信仰中心，变成了其基本特征是可疑的和有争论的一种思想体系。”<sup>②</sup>用梁启超的话说，它像火山喷发或地震一般冲击着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与知识精英对传统价值的怀疑相应的，是传统的价值结构在日渐解体：价值原则与其物质承当之间发生了持续的根本背离。它先是表现为从官场到士人日深一日的弥漫性道德沦丧，最后是辛亥之役令千年帝制随着清朝的颠覆而告终结。而发生在更早的，是同皇室贵胄直接相联的上层社会发生了价值迷失。创作于康乾盛世的《红楼梦》正可以作为这一点的注解。它们本来应当是传统价值观念的最重要的物质承当，是那个社会受人尊崇的信仰之外部表现，现在却悄悄地从内里溃烂了。这是一个加速度行进的过程，到20世纪初，从上层贵族开始的溃疡已经蔓延至整个社会。辛亥革命结束了千年帝制，使得传统的价值系统失

<sup>①</sup>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页。

<sup>②</sup>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40~341页。